

特朗普时代前传：分清里根和克林顿，了解今天世界问题的起源

本文系正式文章：《特朗普时代：克林顿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供给侧改革的全球复兴》的原稿分段刊登。预期按照 5—6 篇刊出，组成《特朗普时代》系列。今天是第一篇，主题是分清里根和克林顿，正本清源，让人们看清今天世界问题的真正来源。

特朗普时代来临，“替代性保守主义”能人集团成为美国新中坚

2016 年 11 月 8 日，特朗普成功当选新任美国总统，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标志着持续了 20 多年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和新的历史时期揭开帷幕。当前，西方主流媒体仍然沉浸于自我安慰和对特朗普嘟嘟囔囔的诅咒中，根本看不到此轮大选的重大正面意义。作为美式全球化最大的客观受益者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最重要构建者，中国应当尽早从西方主流传媒渲染的迷雾中走出来，为与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新兴力量的合作或良性竞争做好准备，迎接供给侧改革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兴。

特朗普的当选不是世界的倒退而是自我修正与前进

当前西方乃至中国的主要媒体对特朗普的当选，一部分人自我安慰这是历史的一个小浪花，一部分人则哀叹世界将“倒退”，即便有反思的人，也认为这是为了“安抚”底层百姓的一次“战略后撤”，是向弱者的妥协。不管是故作镇静还是如丧考妣，这些看法都认为现在的世界（美式全球化）是“先进”的，而特朗普及其支持群体是“低于、劣于”一度主导世界的“全球化精英”，不过是暂时翻天，没有思路和能力扭转“大势”。或者认为特朗普是个说一套做一套的没有原则的“小人”。且不说这些观点是如何的人云亦云，没有去看特朗普的原话、原著、原版影视，只说结论：这些观点是站在历史大潮的对立面——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倒退，而是美国的自我修正和前进。本次大选表明，美国还具有自我修复能

力，在关键历史时刻拯救了自己。

认清趋势必须认清历史，什么是美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指的是克林顿夫妇—戈尔—布莱尔为核心的一小部分英美集团从 90 年代早中期起打造的一套全球化体系，它是欧美走“第三条道路”的新型西方左派（如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欧洲各国社民党）操刀的作品，小布什及部分新保守主义者等表面对手也是其大方向的贯彻者。请注意，是西方左派，不是西方右派！美式全球化鼓吹无条件的自由贸易、金融开放、“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反对国家利益等理念，它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体系，又试图让中国永远臣服，处于“被教导”、“被开化”的仆人地位。这套体系同时标榜各种高大上的理念，比如世界大同、多元文化、环保政治，又不允许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拓展带动发展干扰其价值观。美式全球化制造了一两代“全球化精英”，分布在经济、金融、政治、文化领域，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社会的终极治理方案。

中国的确是美式全球化最大的外国受益者，但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天然掘墓人——这在美式全球化的末期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美式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日趋变得极端鄙视中国，试图在排除中国的基础上继续它们的美梦世界（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从心底里感到了威胁。由此可见，对本次美国大选结果的正确反应是，我们应当和特朗普为核心的美国新兴力量携手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开拓人类科技、产业、星际边疆的新世界。特朗普及其新兴力量有一股开拓星辰大海的气势，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美式全球化起源于克林顿时代而非里根时代

特朗普当选的一个最大迷思，就是他和里根和克林顿这两位美国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显然是克林顿的对手，但他和里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至少从公开表态上看，特朗普自认为是里根（以及更早的，19 世纪的林肯）精神的传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通常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最近一轮大转弯始于 70 年代末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撒切尔和随后上台的里根则是大西洋两岸的主要政治推手。这种主流的认识把里根—撒切

尔 的 80 年代和克林顿—戈尔—布莱尔的 90 年代连成一体，冠以“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称谓。这种认识源自一群批判现实的左翼思想家，但也被美式全球化的精英分子也普遍认可（如美式全球化巅峰时期的纪录片《制高点》，只是作为正面潮流来歌颂）。如该理论成立，特朗普就属于没搞清楚事实，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脑袋不清——因为按照现在对特朗普当选动力的“反思”，说的是 70 年代末美国处于最平均的“大缓和”社会，突然“好景不长”，新自由主义启动了全球化，然后经济繁荣但美国国内工业区工人没有享受到好处，所以这次把特朗普选上台——可是特朗普推崇的里根恰恰是 70 年代末美国社会的改革者。这难道不是逻辑混乱吗？

1998 年能源经济思想家耶尔金发表的《制高点——世界经济的战争》（2002 年改编为纪录片）是典型的美式全球化宣传片，该片也把里根时代和克林顿时代完全混同了。该片经由北京大学原中国研究中心的双学位对中国社会播放，对中国当代中青年一代思想影响很大。

特朗普推崇的：林肯和里根。事实上，特朗普和他的支持群体都是很理性的人，他们绝不是要返回到 70 年代末。70 年代名为“大缓和”（收入差距最小），但事实上过来人都知道，70 年代末欧美深陷滞胀，二战后黄金时代的技术进步和企业活力已经趋于停滞。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是社会弱者，他们并不祈求那种被动的社会贫富压缩。最典型的特朗普支持者——如同脱欧的英国支持者一样，是二战后二十多年培养出来的小镇中产阶级，他们可能学历不高（那时美国大学文凭还没有泛滥），但单兵和集体作战能力很强，是高素质的强者。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反对收入差距，而是反对自 80 年代后期开始在当代金融—互联网（媒体）机器一步步推动下的贫富分化。特朗普本人并不天然拥护共和党或民主党（他曾经很长时间自认民主党人），他只是基于朴素常识，明白美式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要没落，必须有人挺身而出避免国家一起沉沦。

我们要意识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世界、人类的观念，是可以被塑造的。可以认为，今天的美国政治、经济现状，是克林顿启动的。以美国政治版图为例，现在世人皆知的美国“两洋蓝（倾向民主党），中间红（倾向共和党）”这种“理所当然”的政治分布，其

实到克林顿执政后期的 1996—2000 年才真正建立，并在 2000 年大选中最终表现出来（1996 年，美国中部工业州选民对民主党还存有幻想）。取 1984、1992、2000、2016 年四个美国大选年份的各州投票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984 年是里根执政前半期的总结，美国全国一片红，而克林顿当选的 1992 年，除了两洋蓝外，大湖区直到南下密西西比河沿岸都是 V 字蓝区；这说明，在克林顿美式全球化开始之前，美国政治总体上随着历届总统执政能力，经常有大幅摇摆，在美国遭遇系统性经济挑战的 90 年代初，制造业地区的群众曾经把希望放在克林顿身上。然而克林顿的时代与 1992 年人们的想象南辕北辙，这才有中部从蓝变红。而从政治地理变迁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克林顿美式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两洋蓝区正是这三十年的受益者——西海岸加州的硅谷和东北部纽约—康涅狄格的华尔街金融行业。正是这两个行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结合，在经济上让美国走到了今天的困境：科技上的“脱实入虚”和金融上的“自循环”。

如何评价撒切尔—里根时代

在讨论克林顿时代的变迁之前，我们先看看撒切尔—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的面目，看看他们是否要为后来的错误负责。不可否认，受到英美传统私有制（尤其是美国作为移民构架，白手起家的财产观念很强）的影响，撒切尔采取了私有化政策，里根采取了去管制化政策。从初衷上看，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活力，是从解决问题出发的，因为到 70 年代末，英国二战后打造的国有企业体系和美国 70 年代的各种管制体系的确已经疲惫尽现。当然其中一些政策如英国铁路私有化被证明无效，但保守党的这种解决问题的传统，也是其后来领导人如卡梅伦、鲍里斯在看到中国高铁后就极为赞赏并希望合作的原因。

金融方面的政策以及对都市地产的把控是评判领导人用意的关键窗口——因为现代泡沫最容易在这两个领域诞生。在金融方面，英国撒切尔恢复金融城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其成为把国有企业变成上市公司的工具。严格地说，在撒切尔时代，国际货币投机势力还不够强大。投机家索罗斯暴发的重要之战——洗劫英镑是在 1992 年，即英国政客不顾撒切尔的反对生硬提出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时间表

后不久。

在货币政策方面，撒切尔—里根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打击通货膨胀，其中保罗·沃尔克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完成了历史任务，在 1987 年卸任时利率在不高不低的水平——与后来的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有天壤之别。

在住房房地产方面，撒切尔的确推行了住房私有化——主要目的是学习李光耀的公屋到期贱买政策，遏制 70 年代末英国公宅环境的恶化。英国房价的暴涨，集中表现在伦敦地产价格的爆炸式上涨上，而这尤其发生在伦敦工党市长列文斯通执政（2000—2008）期间——列文斯通执政伦敦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嘴上说建经济适用房但实际供给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在产业政策上，撒切尔的确有其计划，她瞄准的是英国的核电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里根在这方面差一些，这是背景决定的（撒切尔毕业于化工专业而里根是个演员）。只能说不成功，不能说不想做，这是时代的原因——冷战结束及反核运动泛滥，而这其资源自克林顿那一边的西方左派运动。由此可见，要为英美今天局面负责的另有其人。

只不过，撒切尔的一些表态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她本人也有时踏入这个陷阱。比如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撒切尔把保守党的一些做法上达到所谓大宪章等水平。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撒切尔想要批评的——尤其是批评欧洲，主要是针对法国 80 年代的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等人的政治路线。而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到，在 80 年代开启全球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正是密特朗为核心的法国社会党集团。那么，怎么评价撒切尔—里根时代呢？应该说，他们主要是立足于解决问题的，而非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虽然受英美传统话语影响容易被沾染。他们看到了问题，在一些方面解决了问题，但在更根本的方面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的，就是产业问题。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大型工业的几个标志：核电产业和协和超音速飞机，就在 80 年代停滞乃至下马。产业空心化的确萌芽于 80 年代中后期。为什么衰落了？谁发现了？谁壮志未酬？这就是欧美世界的 Makers 和 Takers 之争。撒切尔—里根时代的问题，正在于有了政治强人，却缺少产业强人。这一点，在今天中国非常意义，因为我们正在目睹类似的戏剧：格力电器和南玻，只是正在上演令人感慨的时代剧目的两个例子。笔者希望，欧美的悲剧不要在中国上演！

使用到哪里去了，本质上都是提高了他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够使他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这正是科学活动的意义之所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要划分为两部分，社会“扣除”一部分，以作为社会的公共积累（包括公共需要）；另一部分分配给劳动者，以作为个人的生活消费。但是，生活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就会千差万别，实际上劳动者未必会把所得收入全部消费掉，有些劳动者可能把所得收入全都消费掉了，而很多劳动者个人也都做了一些积累（参加储蓄，或购买股票、认购国库券等）。无论是公共积累，还是个人积累，就它们能够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能够使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这一点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由公共积累而提高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集体的生产力，从而能够为集体带来经济利益；由个人积累而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则表现为个人的生产力，从而能够直接为个人带来经济利益。由于各个劳动者投资的情况不同——有的投了，有的没投，有的投得多，有的投得少，投资收益情况也就不同，个人投资多的收益就多，相反收益就少。个人投入资金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当积极鼓励投资。但是，因为个人之间投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收益情况也就存在很大差别。如果无限扩大资金投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有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们应当采取一些相对性的限制措施，即征收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使个人在获得较多收入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虽然不是直接的劳动收入，但它从属于劳动收入，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只有从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出发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否则，运用庸俗价值论或者剩余价值论，把资本收入说成资本创造的，或说成剥削收入、非劳收入则都是不正确的。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只有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鼓励劳动者投资的积极性，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否则，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做出错误的说明就必然会妨碍劳动者投资的积极性，就必然会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四、简短的结论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几个主要经济范畴已经不能客观地反映今天的现实，我们必须根据新现实做出新的概括，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利润是经营劳动所得，利息收入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这就是结论。（完）

再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上接 01 版）

现在进入民营或三资企业的有干部、工人、农民等等。农民都有承包地，工人都有社会保障，他们不是无以为生，被迫而去的，尤其有些干部、技术人员还是主动辞去公职而去的，他们是为了得到更高收入而进入民营或三资企业的。有些打工者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自己又当上了老板，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在大工业时期的雇佣劳动者根本不同。所以说民营经济存在剥削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却总是抱着某种成见，认为公有制经济没有剥削，非公有制经济必然存在剥削，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所以不管在哪种性质的企业中，劳动者只要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就没有受到剥削。在现实中，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效率和收益也各有千秋，有些公有制企业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有些非公有制企业的收入水平也不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公有制经济中的员工有到民营经济里面去的，民营经济中的也有到公有制经济里面去的，通过这样的流动过程，劳动要素就能得到优化利用，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就能得到提高，并达到最大化。

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是在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阶级矛盾尖锐化，资本家成了“多余的人”的时候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实中民营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吗？发生尖锐的阶级冲突了吗？民营业主成了“多余的人”了吗？不，恰好相反，现实中生产力正在飞速发展，阶级斗争已经趋近消灭，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都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生产，丰富了市场，解决了就业问题，上缴了税收，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民营业主不仅不是“多余的人”，反而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稀缺人才。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剥削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矛盾，你说民营经济存在剥削就等于置它于死地，它还怎么发展？当然，有的经济学家又说，现实中存在剥削，但要允许剥削。（参见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剥削观与中国现实》，《经济动态》2002 年第 3 期；刘国光：《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7 年第 10 期，等文）我以为，这是经济学家们的一厢情愿。是否存在剥削可由你说，但是否允许剥削就可由不得你了。劳动人民具有反抗剥削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就是消灭剥削，一旦你说存在剥削，劳动人民是有可能付诸行动的。当

然，存在剥削的说法并无事实根据，人民群众也不会轻信盲从，但是对于它的消极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在现实中，偷盗抢掠富人财产的事情经常发生，为财产而枪杀业主的事情也不时出现。这些都是犯罪行为，应当严厉打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犯罪分子的一个错误认识前提是富人的财产都不是好道来的。很显然，他们的认识并无可靠的根据，但是经济学家们说业主剥削人了，岂不为他们提供了口实？

在生产中，经营者也是劳动者，只不过承担了特殊的经营职能而已。他们是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他们就像战场所需的将军一样，就像乐队所需的指挥一样，须臾不可或缺，他们付出的经营劳动为社会化生产所必需，也是社会必要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经营者所得利润是由经营劳动创造的，属于经营劳动收入（或价格）。

三、关于利息范畴的创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很多劳动者都参与了投资，比如很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都参与了储蓄，或购买了股票，或认购了国库券等等。劳动者投入资本之后就得到了所谓的资本收入，比如利息、股息等等。那么，资本收入是如何产生的，是资本创造的，还是劳动创造的，资本收入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

这里涉及利息、股息的性质问题。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利息范畴已经不能客观反映今天的现实，利息范畴需要创新，我们应当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对利息的性质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

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资本收入说成“非劳收入”了。（参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 年第 2 期；卫兴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经济学动态》2004 年第 4 期，等文）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对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还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比如，“非劳收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非劳收入从何而来，是来自他人的劳动，还是来自自己的劳动？非劳收入的说法并没有说清资本收入从何而来，这不仅没有回答问题，反倒把问题说得不明不白了。

当然，非常可喜的是，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发现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比如，胡培兆教授就说今天的资本收入不是剥削收入（参见胡培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学术月刊》2001 年第 11 期），赵玉

琳和郭连强两位学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见赵玉琳、郭连强：《究竟什么是利润的来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李太森先生就更进了一步，他甚至说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就是劳动收入的另一种形式（参见李太森：《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理性及制度路径》，《中州学刊》2008 年第 3 期）。他们不满于非劳收入的说法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

资本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普遍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获得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对于资本家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做过研究，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为资本家的资本收入做了辩护，说成要素收入了（有的庸俗经济学家甚至说物质要素也创造价值），马克思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揭露了资本家资本收入的剥削本质，说明他们是无偿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收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收入根本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参与投资的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资本收入和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试问，以往所有的经济学家，有谁研究过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呢？没有，没有任何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劳动者获得资本收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在以往的社会，获得资本收入的都是资本家。劳动者是不可能获得资本收入的，即使有也是一种个别情况。既然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以往的经济学家怎么可能研究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要说明劳动者的资本收入问题就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做出全新的概括。

我们都知道，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是一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如果向生产过程投入一定量资金（或者在不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投入资金，或者在增加活劳动投入的条件下以更大的比例投入资金）并具有相应的物质资料，那么他的技术装备水平就能够得到提高，也就是能够使资本有机构成得到提高。一般来说，劳动生产力和资本有机构成成正比，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就会相应提高。个别劳动者如果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就会创造出较多的商品，或者说他创造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比较少。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这里的劳动时间不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生产商品时耗

■ 简练